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单德兴 译
陆建德 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知识分子论

【美】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单德兴 译

陆建德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论 / (美) 萨义德著; 单德兴译. —3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0
(学术前沿)
ISBN 978-7-108-05732-7

I. ①知… II. ①萨… ②单…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 IV. ①D0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4033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罗 洪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2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3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 数 123 千字

印 数 40,001—47,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1 月

目 录

译者序 单德兴.....1

序言.....13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代表.....25

第二章 为民族与传统设限.....43

第三章 知识分子的流亡.....60

——放逐者与边缘人

第四章 专业人士与业余者.....76

第五章 对权势说真话.....91

第六章 总是失败的诸神.....105

附录一 论知识分子.....120

——萨义德访谈录

附录二 扩展人文主义.....138

——萨义德访谈录

附录三 萨义德专著书目提要.....160

索引.....167

后记.....173

译者序

单德兴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萨义德，《寒冬心灵》(*The Mind of Winter*, 1984, p.55)

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 p.29)

萨义德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国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国就读一流学府，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1957

年),哈佛大学硕士(1960年)、博士(1964年),1963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迄今,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萨义德著作等身,为当今闻名国际的文学学者暨文化批评家,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其学术表现和政治参与都很引人瞩目,如著名的非裔美国哲学家魏思特(Cornel West)在本书平装本的封底推荐词中称颂萨义德为“当今美国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但也由于热切关怀、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以致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美国语言学家)一样,成为美国最具争议性的学院人士。他在许多场合提到1967年的中东战争是其人生的转捩点:之前,学术与政治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后,二者合而为一。这点在本书所附的访谈录中也有明确表示。

在《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Identity, Authority and Freedom: 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veller*, 1991)中萨义德进一步提到自己的三重身份:“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这所赋予我的双重角度即使称不上诡异,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12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认同的设定并不是为了排除“异己”(“异”于自“己”的他者),而是为了更宽广的人道关怀,正如他在另一篇访谈录中所说的:“一方面你争取代表自己的权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这些是连接上更宽广的实践(也就是我所谓的解放),否则我是完全反对的。”[《美国知识分子与中东政治:萨义德访谈录》(*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 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W. Said*), 1988,

p.52.]

萨义德的学术及个人生涯颇具特色。他是早期少数认识到欧陆理论的重要并率先引入美国学界的文学及文化学者。他所引介的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论述等等,也曾专文讨论过包括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法国历史学家)在内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更把这些理论与批评融入并落实于特定作家、作品及专题的研究,而不局限于严格定义下的文学。因此,在从事人文学科的科际整合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上的突出表现,和结合文学/文化理论及文本分析的批评理念与策略密切相关。

第三世界的背景使他对于研究对象有着异乎英美学术主流的角度及关怀。例如,他的第一部著作《康拉德与自传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 1966)系根据博士论文修订而成,讨论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内容结合了康拉德的生平、书信、中短篇小说,表面看来与主流的研究方式相似,然而在全书伊始萨义德写道:“他[康拉德]是位自觉的外国人,以异国的语言[英文其实是康拉德的第三语言]撰写隐晦的经验,而他太了解这一点了。”(4页)由此可见,他之所以对康拉德感兴趣,除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之外,类似的流亡、移民、归化、书写、创作、自传等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换言之,他的研究除了着重康拉德作品的美学特色之外,对于来自同属殖民地区的背景(波兰当时被俄国沙皇统治)而且以英文创作的相关经验也有着深刻的领会。康拉德作品中对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描写以及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再现(representations),成为萨义德恒久的兴趣以及重复

讨论的主题。

正因为兴趣不局限于所谓的“纯粹”学术探讨,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不管是学术的或宗教的、政治的),萨义德在第二本专著《开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1975)中深入探讨“源始”(origin)之不可能及“开始”的意义,主张没有神话/神化的、特权的、单一的“源始”,而是世俗的、人为的、不断重新检验的、复数的“开始”(xiii页),这些“开始”不仅因应不同情境的需求而产生,而且是“产生意义的第一步”(5页)。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独一无二的权威与崇拜,着重在不同历史情境、社会背景、文化环境、政治脉络下所开展的新意。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更拈出“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一词,强调批判意识的重要,以相对于崇拜权威、偶像的“宗教批评”(religious criticism)。这种批判意识以及对于“对立”“对抗”“对反”“对位”的重视成为其论述的基调。在他心目中,“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29页)而知识分子的特色就是批评/批判,因此他以这句话结束《世俗批评》一文:“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30页)

强调“对立”“对抗”“对反”“对位”与萨义德身为美国名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背景息息相关;而他以著述批判西方主流社会对于东方的错误认知与宰制,并积极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正是这种理念的具体实践。学理的兴趣与亲身的体验(尤其已入籍美国在大学任教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特别重视再现的问题。他在号称中东研究的三

部曲中——《东方学：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1978) 关于Orientalism一词译作东方主义或东方学，曾经发生过讨论。本书中在提及这本著作时，遵从中译本的译法：东方学；在作为一种对于东方的态度来讨论时，沿用译者的译法：东方主义]、《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看待世界其他地方》(*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1981)——深入探讨相关问题，从此声誉鹊起，影响力远超过学术圈，但也引起很大争议。

这三本书的主要写作动机就是批判西方主流的学术及媒体对于所谓“东方”(主要是中东的伊斯兰教世界)的错误呈现，其中以第一本涉及面最广，第二本落实到巴勒斯坦的自决问题，第三本则讨论当代现象，尤其西方媒体。这些作品的研究范围广泛，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起)到当代西方学者、作家、旅行家、媒体记者如何来认知、想象及建构东方：相对于西方所代表的文明、进步、开化、启蒙，东方则是野蛮、落后、未开化、待启蒙；或如萨义德所言：“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而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方以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东方学》，40页)。总之，此处知识与权力密切结合，学术与帝国主义互为表里(这里福柯的影响明显可见，但萨义德却有所转化)，而西方之于东方便是启蒙者与待启蒙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简言之，就是主与奴的关系。这三部作品主要目的就是分析进而解构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历史、人类学等文本以及报章、杂志、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所呈现的东方。

对于萨义德这几本书的反应很歧异,不少西方人士视萨义德为反西方、仇视西方的急先锋,但也有不少第三世界(尤其中东)人士以之为反对西方的论述,把萨义德和反西方主义、提倡部族主义画上等号。因此,余英时的两点提醒特别值得中文读者留意:“萨义德的‘东方’主要指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并不包括中国。……这是中国人引用‘东方主义’的说词时首先必须注意的重要事实。另一应注意之点是萨义德虽然主张中东阿拉世界各族群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但他并不取狭隘的部落观点。相反地,他认为文化认同绝不等于排斥‘非我族类’的文化。……总之,今天世界一切文化都是混合体,都杂有异质的、高度分殊的因子,没有一个文化是单一而纯粹的。”(《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12—13页)

在《东方学的重新省思》(“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1985)一文,萨义德提到对于《东方学》的一些批评,并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讨论的重要议题包括“其他文化、社会、历史的再现,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89页)。而在这本书出版十七年后的《〈东方学〉后语》(“Orientalism, an Afterword,” 1995)一文,他更津津乐道其影响:“有关非洲学和印度学论述充满活力的研究,对于从属阶级历史(subaltern history)的分析,后殖民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批评、音乐学以及在女性主义和弱势论述广泛的新发展——我很高兴《东方学》经常能使这一切有所改变。”(44页)然而,他也不免悻悻然提到,连汉学研究都受此书影响[如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都有深思、诚恳的回应],但所谓的东方研究却依然故我。

在该文他还对别人指控他反西方的说法有所辩解,指出《东方学》是反本质论的(anti-essentialist, 34页),认同其实是建构出来的(35—36页),反对东西对抗的刻板印象(38页),批评东西二分法之不当(39页),反对文化纯粹论,指出“文化是混杂的、异质的……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是彼此相关的、相互依存的”(53页),因此对于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化观(各文化间彼此隔绝)及文明冲突论大加挞伐(53页)。其实,在《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中萨义德已左右开弓,批评美国大学里西方保守势力的反扑以及阿拉伯大学中的政治化倾向,认为是以单一国家/民族认同的落伍观念宰制了人生的复杂多样(11页)。如果单一的认同或身份观念已有如此大的后遗症,那么把世界区分为数个对立、冲突的文明的做法当然更值得非议。

我们从亨廷顿的近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更可清楚地看出,他将西方与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对立,把世界主要划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三种文明,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呼吁欧美(尤其美国)维持各方面的既有优势甚或既得利益。由这些论调可以看出,即使在资讯发达、跨国经济与文化密切交流而有“地球村”之称的今天,欧美世界的若干精英分子挟数世纪以来积聚的强大优势,依然以对抗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其他(相对弱势的)地区与文明。而身为移民国度(美国)名校(哈佛大学)精英的亨廷顿,其观点的简化与谬误可从原书封面看出:以十字架代表欧美,新月代表伊斯兰世界,太极图代表儒家文化。

前已提及,萨义德的学术发展、认知与理论颇受当代欧陆

理论启迪,如福柯对于知识与权力二者关系之探讨便是《东方学》的重大奥援。然而在引介、运用欧陆理论之余,他也有相当的批判,认为它们不够关注文学/文化与历史、社会、政治的相关性,对抗意识不够强烈,也未能化为积极的行动。因此,萨义德对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诸多观点,尤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等人的论调(如“宏大叙事已不复存在”),颇不以为然,而以其心目中提倡自由、解放、平等、公义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与之抗衡。就此而言,巴勒斯坦的背景当然扮演重要角色,使他深切体认到欧美理论之不足。换言之,面对原先自己协助引入美国学界且成为主流的欧陆理论,他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欠缺,他乞灵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范农(Frantz Fanon)、赛沙尔(Aimé Césaire)、詹姆斯(C. L. R. James)等批评家与实践者,以进行自己的抗争。而他的《东方学》也和范农、赛沙尔、詹姆斯等人的著作并列为弱势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的奠基文本。总之,他近二十年来的作品,包括晚近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大抵依循这条路线。

萨义德在音乐上也颇有造诣(这点得自母亲的熏陶),并自1986年起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写音乐专栏,在乐评中带入文化批判的观点。1989年5月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发表系列演讲时,他当场弹奏钢琴来佐证论点,展现多才多艺的一面[演讲结集出版为《音乐之阐发》(*Musical Elaborations*, 1991)一书]。而他个性的另一面则是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特立独行与勇敢无畏表现出他的人格力量。早在巴勒斯坦人仍坚决反对承认

以色列时,他便主张予以承认并与之和谈;但在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Yasir Arafat)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原则宣言”[*the Oslo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1993年9月13日)]时,萨义德认为该协定内容有如向以色列投降,漠视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与现况,严重出卖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因此虽然举世普遍赞扬该协定。萨义德却严厉地批评,并与阿拉法特划清界限。作家拉什迪因为撰写《撒旦诗篇》(Salman Rushdie, *The Satanic Verses*, 1988)触怒伊朗的革命及宗教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而被下达格杀令。萨义德坚持言论自由,公开声援、撰文支持拉什迪,甚至在开罗和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研讨会中依然直言不讳。而萨义德本人也因参与政治活动多次遭到死亡威胁。他告诉巴萨米安(David Barsamian),“我在半打的中东死亡名单之上”。对于这些死亡威胁他则说:“不要太去想它们。……如果在意那种问题,最糟的情况就是什么事也做不了……我认为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懈,谨记自己的所言所行远比是否安危意义重大。”证诸他的行为,这绝非浮夸之词。阿马德(Eqbal Ahmad)在《笔与剑:萨义德访谈录》(*The Pen and the Sword: Conversations with David Barsamian*, 1994)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有一次在贝鲁特露天用餐时,旁边发生枪战,其他人都赶忙走避,唯独萨义德依然谈笑风生,继续刚才的话题(8页)。他近年罹患白血病(leukemia, 俗称血癌),虽然多次进出医院,但只要病情一控制住就教学、写作、演讲、旅行如故。访谈结尾问到病情时,他说:“我试着不太去想未来。人总得继续下去。……我认为首要之战在于试着不要把它当作你每个清醒时刻的中心,把它摆在一边,努力处理手头上的工作。我觉得有许多要说、要写,我只是继续做那些。”(107

页)罹病之后他的出版反有加速的趋势,显示在面对恶疾时的因应之道:把握生命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著书立说,发挥影响。1997年8月在与译者交谈时,他提到目前除了为报章杂志撰稿外,正在写三本书:一本回忆录、一本有关歌剧的书以及一本讨论艺术家晚期风格的书。

其实,贯串萨义德学术与政治活动的可以说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议题。长久以来他就对知识分子的议题深表关切,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开头便对所谓的专业知识加以批判,并引用班达(Julien Benda, 1867—1956)之说(2页),结尾更期勉现代批评家勿失知识分子的本色(292页),这些在本书都得到进一步的阐扬。萨义德在许多文章及场合都对知识分子极为关切,成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曾专文讨论,如《后殖民世界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1986)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都会文化》(“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 1990),本书更是这些年来切身体验与深思熟虑的心得。

就本书而言,读者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萨义德这位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见解。虽然他不鼓励读者以自传的方式来阅读本书(xii页,亦见本书30页),然而他的经验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却使人不由得把这本书当成“现身说法”。换言之,这本书不但是萨义德谈论知识分子(Said on the intellectual),也是萨义德身为知识分子(Said as an intellectual);更精确地说,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巴勒斯坦、归化美国并在长春藤名校任教数十年的名学者萨义德,如何借着瑞思系列演讲(Reith Lectures)的机缘,把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见解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达给英语世界。其中我们

可以看到他多年关心的许多议题,如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再现的政治与伦理(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representation)、人文主义的关怀、反对双重标准、坚持批判立场、强调文本(texts)与语境(contexts)的关系等。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观本身就值得深入探讨。

本书原文名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再度显示了萨义德对于“再现”的重视。“Representation”一词有许多不同涵义[如修哈和斯坦在《反思欧洲中心论:多元文化论与媒体》中便提到宗教的、美学的、政治的、符号的四种(Ella Shohat and Robert Stam,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1994, pp.182-183)]。在本书中“Representations”至少具有下列含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对于许多读者而言,书中的另一重含义则是透过这些而代表/再现出的萨义德。由于中译难以兼顾这些含义,只得勉强译为《知识分子论》,取其中译可能衍生的另一些意思:“知识分子本身的论述”以及“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就本书而言,更是“知识分子讨论知识分子的论述”,而在此代表/再现中,其实更代表/再现了萨义德。对于长期关注知识分子这个议题并实践个人批判理念的萨义德而言,这是当时就这个议题的综述与反省;而对于曾撰写《旅行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一文、讨论理论在旅行、翻译、移植到另一语境后的境遇的萨义德而言,作品中译后的得失与转化应属意料中事,而此书在中文世界的“开始”、“旅行”与效应也值得进一步观察。

“翻译”除了“跨越边界”，也是一种代表与再现——通过另一种语文来展现原文。为达到充分译介的效用，除了撰写绪论，去年10月本已备妥相关问题拟与萨义德进行访谈，但因对方忙碌及健康因素而未能实现，转而征得同意逐译1993年的访谈作为附录（详见附录二）。今年8月译者特地前往纽约。经过一些周折总算得以和萨义德进行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内容除了他的心路历程、学术发展外，有不少问题环绕着“知识分子”的主题（详见附录一）。此外，为了让中文读者对于萨义德的著作有一通盘认识，特地搜集其全部专著并撰写书目提要，在此感谢陈东荣先生和廖炳惠先生在哈佛大学协助搜寻萨义德较为难觅的著作。为了方便中文读者，另亦特别缉制索引。中译力求信实、可读，在翻译与校对过程中多次修订，加入若干译注、译按（为求行文简洁，按语直接纳入括号中）及相关人士的生卒年，并蒙陈雪美小姐、赖维菁小姐、强勇杰先生提供许多资料及意见；在翻译过程中，李有成先生、何文敬先生、纪元文先生鼓励有加，谨此一并申谢。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六日

台北南港